

北魏平城政权的建立与封建化

导师：田余庆（北京大学） 撰者：李凭

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在公元398年至494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是以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市区附近）为其统治中心的，我们不妨称之为平城政权，并将与之相应的时期称为平城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平城政权基本上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是颇为坎坷、曲折的。

一 从部落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转化

平城政权建立前后，拓跋部面临着三种前途：其一、象他们祖辈那样，在原始社会里徘徊；其二、任部落内部奴隶制因素日益发展，进而建立奴隶制社会；其三、象在它之前进入中原的其他游牧部族那样，仿效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走封建化的道路。因而在拓跋社会内，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主线，则是以道武帝为首的拓跋统治者与异族部落贵族之间的斗争。前者主要由《魏书·官氏志》中所谓的宗族十姓贵族组成，代表了新兴的向封建化发展的方向；后者所在的部落在《官氏志》中被称为内入诸姓与四方诸部，这些贵族代表了力图保持部落制度的旧势力。它们之间的激烈斗争表现为持续了十年多的部落战争。

天兴三年十二月乙未和丙申两道诏书，可以说是道武帝在对异族部落的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的背景下颁布的。这两道诏书反复地强调北魏皇权是“天人俱协”、“大运所钟”的；而臣下

的职权是皇帝赐与的，因而“用之则重，捨之则轻”（见《魏书·太祖纪》）。其中心思想，当然是要建立专制主义的统治。再结合天兴年间道武帝推行的一系列仿效中原传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来看，乙未、丙申两诏书的颁布可以看作是平城政权纳入封建集权轨道的标志，它表明拓跋部的统治机器在北魏建国之初就从部落联盟转化成了封建集权性质的国家。虽然它还远不完善，但是在后来平城政权的发展过程中，它却一直起着主导的作用。因而，这一转化实际上也表明拓跋部开始跨入封建社会的门槛。

天兴三年以后，虽然大部分异族部落已经臣服于拓跋部，但是异族部落贵族并不甘心失去以往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他们一有机会就进行反叛。因而，以道武帝为首的拓跋统治者与异族部落贵族之间的斗争并未结束，而只是从前一阶段的部落战争转化成各种形式的反抗与镇压。从现有史料所作的统计来看，这种斗争依旧是当时北魏政治的主要内容。因为，被道武帝杀戮和降黜的臣僚中主要是异族部落的贵族，其次才是汉族士人，宗族十姓贵族中被戮和被黜者则很少；而且，道武帝对异族部落贵族的镇压并非象《魏书·太祖纪》所记载的那样仅限于道武帝末年，而是从乙未、丙申两诏书颁布时就开始了的。

虽然也偶尔实行过一些羁縻政策，但总的来看，道武帝对异族部落贵族的镇压却是十分严厉的。到天赐六年（409年），终于酿成了一场政变。这场政变的导火索虽然是皇位继承权之争，但实际上却与道武帝对异族部落贵族的镇压密切相关。后来，道武帝虽死于政变之中，但他创建的封建集权统治的根基却并未动摇，在政变平息之后接替皇位的明元帝继承了他的衣钵。

二 离散诸部措施

在登国元年（386年）北魏建国之前，拓跋部刚刚从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家长制社会不久。而在建国之后大约十年多的时间

里，它便迅速地向封建社会转化。这在拓跋部的发展史上实在是一个巨大的飞跃。不过，推动这一飞跃的最主要因素并非长期的部落战争，而是与十年部落战争相始终的离散诸部等措施。

离散诸部并非孤立的法令，而是属于包括“分土”、“定居”、“使役”等措施在内的一套综合性法令中的一项具体的措施；并且，它是与道武帝推行的一系列农垦政策相配合地实施的。由于这一特点，在有关北魏的历史资料中，它仅仅在《魏书》的《官氏志》、《高车传》和《贺讷传》等三条史料中被单独提及。

道武帝施行离散诸部措施的目的，是要剥夺那些陆续地归附和被征服的异族部落酋帅们对其部落的统领权力，从而将这些部落的部民连同其酋帅在内统统变为平城政权治下的“编民”，并让他们去从事农耕。但是，这样做不仅违背了游牧部落的旧俗，而且直接损害了异族部落贵族的经济、政治利益，因而激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这种反抗是离散诸部措施两度被迫中断的主要原因之一。

道武帝首次离散诸部的时间是登国元年，地点是在盛乐。它是与息众课农政策相配合实施的。同年八月，由于乙弗等部的反抗和西燕支持下的窟咄的进犯，道武帝不得不率拓跋部逃往阴山以北，这次离散诸部措施便流产了。第二次离散诸部是与登国九年（394年）由卫王拓跋仪主持进行的屯田相配合实施的。这次离散诸部虽然只在五原地区的部落中施行，但其意义并不亚于第一次，它是拓跋部落联盟大规模地分化成为从事农业与继续游牧的两大部分的标志。与此相应，拓跋部的军队也增加了一项新的监督农业生产者的职能。不过，第二次离散诸部又因第二年后燕慕容宝的进犯而中止。直到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抓住北魏统治下各部落集中于大同盆地内的大好时机，凭藉刚刚取得的败亡后燕的胜利之威，才达到了全面实施离散诸部措施的目的。这次离散诸部实际上就是该年二月道武帝对各部落进行全面性农、牧分工的所谓更选屯卫。

离散诸部等措施是道武帝时期最有意义的改革之一。它促使北魏统治下的大部分游牧部落的组织分解，进而将部民转变为平城政权直接统治的编民；从而加速了这些部落的产业由游牧向农耕转化和部落内部阶级分化的进程。因而，离散诸部等措施在推动拓跋部落联盟向封建集权国家的转化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然而，道武帝为什么会在北魏建国之初就积极推行离散诸部等有利于拓跋统下各部封建化的措施，而且在对于反封建化势力的斗争中能得到拓跋本部宗族十姓的积极支持呢？其中有历史上的原因。

在拓跋部的历史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那就是昭成帝三十九年（376年）代国被前秦败灭至登国元年道武帝重建政权前的一段时间。由于这是拓跋部的亡国时期，加上史家记载的疏略，它成了拓跋部历史上的一个断裂带。然而，从民族交往与融合的角度来看，这个断裂带恰恰是很有意义的。其中，有两件事值得特别地提出。

一、《晋书·苻坚载记》称，前秦灭代后，“散其部落于汉鄯边故地”，并“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从而将封建性的生产方式输入了拓跋部。前秦的作法使拓跋部的游牧经济和部落组织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后来道武帝实施的离散诸部等措施实际上正是前秦“散其部落”的翻版。因而，拓跋本部对此并不觉得生疏与突然。所以，与其他部落相比，它能够较快地适应平城政权建立前后的种种变化并支持道武帝对异族部落贵族的斗争。

二、昭成帝和一部分拓跋贵族被前秦俘虏到中原的长安等地，其中一些人还被送到前秦的太学中去学习。这为后来再兴的拓跋部造就了一批受过中原先进文化熏陶的人才。当这些人重返拓跋部时，便成了拓跋部中封建化的带头羊。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道武帝。

道武帝在代国灭亡以后的经历，《魏书·太祖纪》记载极略。

同书《燕风传》中在燕风与秦王苻坚讨论昭成帝去世后对代北事务的安排问题时提到了道武帝，但这段史料在时间和地点上都存在着纰漏，并与《太祖纪》相矛盾。其原因，正如周一良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崔浩国史之狱》一文中指出的那样，由于崔浩国史之狱的缘故，史臣不敢直书北魏史事，致使北魏早期的历史疑窦丛生。周先生还指出，对于代国灭亡前后的历史，《晋书》和南朝史籍所载反较《魏书》正确。

如将《燕风传》与《晋书·苻坚载记》、《宋书·索虏传》和《南齐书·魏虏传》等记载相对照，不仅其时间与地点上的纰漏顿消，而且可以互相印证地勾勒出道武帝早年的经历。这段经历是：他先与昭成帝等一起被俘往长安，然后从长安流徙蜀地，昭成帝死后，又迁回长安；淝水之战后，随慕容垂到中山；最后，被慕容垂送回代北。其中，尤以在长安的时间为久，而且较长的一段时间是追随着慕容垂这样一位汉化程度很深的鲜卑贵族的。正因为有如此一段经历，道武帝才对中原的文化相当熟悉，并且在北魏建国之初就积极地推行有利于拓跋部封建化的一系列措施。

拓跋社会虽在平城政权建立之初就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但是旧的部落制度和风俗却非一朝一夕能消失的。同时，由于平城政权是在以道武帝为首的宗族十姓对异族部落贵族的激烈斗争中建立与巩固起来的，在这样的前提下，最初组成平城政权核心力量的便自然不再是广泛的、原先拓跋部落联盟中各部落的贵族的集合，而只是以宗族十姓为主要成份的、狭隘的统治集团。这些，都使平城政权内部矛盾十分尖锐、复杂，并且导致了接连不断的政变。这在皇位交替时表现得最为显著。在部落遗制和遗俗中，兄终弟及遗制和尊崇母权的遗俗对平城政权发展的干扰、影响尤为突出，它们分别导致了太子监国和太后听政这两种皇权“异化”现象。

三 明元、太武两朝的太子监国

以太子监国作为皇权的辅助方式是明元、太武两朝政治的特色。

明元帝以其长子拓跋焘为监国事见于《魏书·太宗纪》等史料中。然而，宋人在《太宗纪》卷末校语中对拓跋焘监国时的身份却提出了质疑，他们以《太宗纪》等史料中不言拓跋焘为皇太子事为据，认为拓跋焘监国时的身份是泰平王，并非皇太子。不过，他们同时又认为《太宗纪》并非魏收所作《魏书》的原文，而是据魏澹所作《魏书》补入的，并且怀疑其中有脱误。而在《魏书·奚斤传》中，却有“世祖（拓跋焘）为皇太子临朝听政”之语；对于该传，宋人并未查出脱误之处，更未曾证明其为后补者。因而，宋人怀疑的证据是不足的。

除《魏书》外，《太平御览·皇王部》、《北史·魏本纪》和《资治通鉴》宋永初三年条等资料中也有关于拓跋焘监国的事迹。《太平御览》中有“诏皇太子临朝听政”之语，而《北史》、《资治通鉴》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立太平王焘为皇太子”。《北史》、《资治通鉴》成书晚于《魏书》，而《太平御览》的情况却不同。《太平御览》虽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八年，但其内容却主要依据北齐时编的《修文殿御览》。而《修文殿御览》有关北魏的部分则直接采自魏收书之原文，它较今本《魏书》中补自魏澹书的部分更为原始、可信。

以太子监国并非北魏特有的现象，中原王朝中早就有过先例，不过大多是权宜之计。但是，在北魏明元、太武两朝，这却是一种长期的、固定的作法。明元帝这样做的原因在他的两次谈话中说得很明白：其一、因其疾病弥年，疗治无效，因而想在生前就将政权交付太子；其二、让太子代为行使行政权力，以便自己腾出身来去镇压国内的反抗和征伐异国。但是，实际上，明元帝

心目中还隐藏着一个不便道明的原因，那就是不愿按兄终弟及遗制将皇位传给弟弟。

兄终弟及遗制在明元帝时尚未废除。明元帝虽以长子身分登上皇位，但他的皇位是从他弟弟清河王拓跋绍手中夺得的。清河王绍是发动政变杀死道武帝后获得皇位的。

清河王绍政变事在《魏书·清河王绍传》和《资治通鉴》晋义熙五年条中均有记载，但文字略有差异。前者说，清河王绍杀道武帝后曾问群臣道，“我有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后者也载有类似的问话，只是“父”字之上多一“叔”字。从清河王绍说话时道武帝已被杀的情况来看，似依《资治通鉴》作“叔父”较合理。而且道武帝虽无同母同父弟，却有同母异父弟。由《魏书》的记载可知，他们是卫王仪、秦王觚和阴平公烈。当清河王绍政变时，阴平公烈尚在世，他应当就是清河王绍语中所言的“叔父”。这样，《资治通鉴》的记载得到了证实。它表明当时兄终弟及遗制不仅没有明确废止，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影响，否则，清河王绍便无须向大臣们发出“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从谁？”的问话。

明元帝末年，在世的皇弟尚有广平王连和京兆王黎，他们虽然年龄尚幼，但均较太子焘长，因而皇位之争的危机仍然潜存着。为了防止身后发生皇位之争，明元帝采纳了崔浩的建议，在其生前就将最高统治权授予太子焘，使他的皇位继承权成为既定事实。这正是明元帝心目中以太子监国的最主要的目的。

以太子监国的办法除却兄终弟及遗制的影响实在是一大发明。自此之后，中原王朝惯行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成了北魏王朝皇位传递的传统。

明元帝去世后，太子焘顺利地继承了皇位，是为太武帝。太武帝仿效明元帝，也以其太子拓跋晃监国。不过，在太子晃监国时太武帝正是年富身强之时，因而太子晃监国时间延续了十三年

之久。但是，时间一久，太子监国的弊端便逐渐暴露出来。因为皇帝与太子在军事和行政上的分工实质上是皇权职能的分化，这种分化的本身正意味着对于集权于一身的封建专制统治的否定，因而必然导致皇权发展的危机。所以，当太子晃的权力膨胀到一定程度时，东宫集团便形成了；东宫势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与皇权之间的斗争便不可避免；最后，政治危机就爆发了。于是正平元年事变发生，太子与皇帝相继被杀。

正平元年事变是太武帝末年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中的一件，在其之前有崔浩国史之狱，之后有太监宗爱政变。这些事件是平城政权内部各种势力的政治表现的集中反映，也是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由此而导致的皇帝与东宫集团同归于尽的结局说明，以宗族十姓为主要成份的统治集团已经难以驾驭整个北魏社会了，必须加以改革，使之包容更多的政治势力，以适应平城政权发展的新形势。但是，宗族十姓集团并不能自觉地进行这样的改革，因而在宗爱政变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北魏政局仍处于动荡之中。在这种状况下，皇权不仅难以伸张，而且在尊崇母权的遗俗的干扰下发生“异化”，导致了太后临朝听政。

四 子贵母死故事与文明太后临朝听政

北魏后宫有赐储君嫡母死的制度，史家称之为子贵母死故事，其首例是道武帝杀明元帝母刘氏。据《魏书·太宗纪》载，道武帝出此残忍之策的目的是“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道武帝为何如此深忌“妇人后与国政”呢？这又与他早年的经历有关。

代国灭亡到北魏建国的这段时间里，道武帝的年龄在六至十五岁之间。由于年龄幼小，他始终处于其母贺氏的监护之下。道武帝受监护的这段生活中，值得记述的有四件事情：一、贺氏以道武帝的名义绑缚昭成帝投降前秦，致令她与道武帝一起被流徙蜀地；二、在贺氏的羽翼下客居蜀、长安、中山等地；三、在贺氏

的保护下，摆脱了在独孤部和贺兰部遇到的危难境况；四、在贺氏及其兄贺讷的扶持下登上王位。这四件事说明贺氏对道武帝的政治前途起过关键性的作用。因而，在道武帝登上王位以后至皇始元年（396年）贺氏去世为止，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受制于贺氏的。由于这些经历，使道武帝对于母后干预政治的现象具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和认识，为了使其身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他杀了明元帝嫡母刘氏。

北魏以及代国的历史上，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妇女不乏其人，这与拓跋部离开母系氏族社会为时不久因而社会尊崇母权密切相关。母权制遗俗既然在北魏社会影响颇深，那就绝非是以简单的杀戮办法所能根除的，它会通过另外的方式和途径继续表现出来。

由于丧母的储君往往幼小，需要有人抚养，因而由于子贵母死故事派生出了以保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进而发展为保母干预政治的怪诞现象。第一位干政的是太武帝保母窦氏，后来又有文成帝乳母常氏。常氏因为在正平元年事变中保护了太子晃之子文成帝，所以当文成帝即位后她的地位和权力便立即同于嫡亲的太后。她在后宫掌有生杀大权，为了压抑文成帝而以子贵母死故事杀了文成帝宠妃李氏，然后将自己选中的冯氏扶上了皇后的宝座，这位冯氏就是后来的文明太后。常氏还将其触角伸向外朝，乙浑、林金间等人成为政治上的暴发户便与常氏的支持有密切关系。

就这样，尊崇母权的遗俗通过保母干政的方式又顽固、曲折地表现出来。窦氏、常氏的干政最终发展成为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从历史的脉络来看，文明太后的临朝听政恰恰是由子贵母死故事经保母抚养储君的惯例而引发出来的，这是道武帝始所未料的。

文明太后是在平息文成帝去世不久发生的乙浑之乱后第一次临朝听政的。但为时不久就罢令了。从《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的记载来看，文明太后的罢令似乎与抚养孝文帝一事有关。因而，有的专家学者便推论孝文帝并非献文帝皇后李氏所生，而是文明

太后的私生子。最早作此推论的是吕思勉先生，他的主要理由是其时献文帝年仅十三，似难生子。后来，日本学者大泽阳典先生也对此作了肯定的论证。近年，台湾学者郑钦仁先生又提出了一条史料作为证据，似乎使吕先生的推论成了定论。但是，无论从北魏后宫生子的年龄记录来分析，还是从现代医学观点去看，献文帝的生育能力是不必怀疑的。郑先生所依据的史料见于《魏书·杨椿传》，其中杨椿所说的一番话中有两处将文明太后与孝文帝称作“母子”。但是，无论从这番话的上下文意来分析，还是联系同书中其他例证去看，这两处的所谓“母子”，都只能理解为泛称。而且，从该传所反映的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只能导出与郑先生看法相反的结论。因此，有理由认为，文明太后是迫于献文帝的压力而不得不罢令的。

文明太后罢令后，她与献文帝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他们之间的斗争最后以献文帝被文明太后害死而结束。但决定高下的转折点却是献文帝的禅位。围绕禅位所作的讨论的要害是北魏最高统治权的归属问题。这时候，通过抚养的方式而被文明太后牢牢地控制的孝文帝，成了文明太后手中夺取胜利的一张王牌，帮助她实现了第二次临朝听政。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文明太后为什么要在被迫罢令后竟以太后之尊去抚养并非自己所生的孝文帝了，这实在是一种高明的政治预见。这种预见得自保母干政的历史经验：只要控制了储君，就有攫取最高统治权的机会。

文明太后的胜利无疑是母后权力的一次伸张。它的产生虽然与母权制遗风相关，但是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倒退。因为当文明太后将自己凌驾于皇权之上时，她自己就成了封建集权的代表。

五 畿内移民对平城政权的影响

平城政权虽然是封建集权的政权，但是它的集权范围仅仅限于畿内，在畿内以外的广大中原和草原地区，平城政权分别实行

宗主督护制和领民酋长制，通过宗主和酋长去间接地统治那里的人民。

畿内是指平城周围方圆数百里的范围，它大体上相当于今山西省雁北地区，亦即大同盆地。由于平城政权的集权范围仅限于畿内，因而这个地区在北魏社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同盆地内地势平坦，桑乾河及其支流穿流其间，虽然气候较冷，但在古代仍是农业相对发展的地区。因而，这里成了道武帝离散诸部，使之分土定居，并为几十万灭燕以后强行迁徙来的中原各族人民计口授田的良好场所。经分土定居后的部民和计口授田后的中原各族人民成了平城政权最初实行封建集权统治的主要对象。

道武帝以后，平城政权仍继续不断地将各地 的人民徙往畿内。久之，在畿内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原与草原的特殊的移民区域。在这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内，风俗与习惯不同的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共同生产与不断的生活交往逐渐地融合起来。从有关史料所作的历次徙往畿内的移民的成份与数量统计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畿内移民中的汉人比例也在不断增长，因此民族融合的总的趋势是向着汉化的方向发展的。这种趋势为平城及其周围地区的封建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而不断涌入的移民群也象大海的波涛一样不断地冲刷着平城政权，使它的机构与体制更趋于完善。不过，移民与平城政权的关系还是历经曲折的。

总的来看，移民中的各族、各阶层在政治上 都表现得很活跃。道武帝以后，移民中的一批汉族士人陆续进入北魏政府之中，帮助拓跋统治者建立起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只能起谏议性的作用，而且在后来的国史之狱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太武帝末年北魏社会内外诸矛盾日益激化，出现了正平元年以后长达二十五年的政治动荡。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五年间不断发生的政变中的主角和政变以后攫取最高统治权力者大

多是畿内移民中的下层人物，宗爱、乙浑、常氏及文明太后等均属此列。不仅如此，在明元帝推翻清河王的政变中，在太子晃的东宫集团里，也都有一批下层人物在积极地活动。不过，比较而言，能够跻身北魏政坛的下层人物毕竟是不多的。但是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这是因为他们植根于近在平城政权咫尺之间的畿内广大移民之中。

政治动荡使宗族十姓统治集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汉族士人势力再次抬头的机会。与此同时，离散诸部以后被剥夺了统领部落权的异族部落贵族中的一部分也逐渐地转向封建化，并在政治上发展成为一支有力量的势力，形成《魏书·官氏志》所谓的勋臣八姓集团。在畿内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在长期政治动荡的冲击下，胡、汉上层势力终于携起手来，由拓跋宗族、异族贵族和汉族士人三者联合组成了新的、较前广泛的统治集团。这个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前为文明太后，后是孝文帝。

经此转变之后，哺育平城政权的大同盆地就显得闭塞和狭小了，向广阔的中原进发成了拓跋和畿内各族人民的必然趋向。

结 语

平城时期的北魏社会虽然一开始就踏上了封建化的道路，但是部落遗制和遗俗仍不断地干扰和影响其封建化进程，消化部落遗制的作用和排除部落遗俗的影响并非短期所能奏效。同时，北魏王朝虽然一开始就是封建集权国家，但其集权机制还远不够完善，对它的改革仍是一个艰巨、曲折的过程。这两个方面的原因，使拓跋政权在平城停留了将近一个世纪。不过，对于刚刚离开原始社会和游牧状况而又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的拓跋部来说，这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参考研究部